

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

第二卷

扎古尔·摩西 主编
梅祖培、龙治芳等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国外版权

Editor: Zaghloul Morsy

Thinkers on Education

Prospects No. 87/88

Unesco Edition

根据《教育展望》第 87/88 期译出

责任编辑: 龙治芳

责任校对: 徐元歌

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810 电话: 6022134 电报挂号: 623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21.75 印张 字数 405 (千)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 6022124

ISBN 7-5001-0369-7/G·71

定价: 16.00 元

序 言

本书是四卷本《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的第二卷。全卷共收集100篇介绍世界各国最负盛名的教育思想家的文章。全书的四卷本分别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的教育杂志《教育展望》1993至1994年各期,即第85/86、87/88、89/90和91/92各期的合订本形式出版。全书所录人物介绍文章均按人物姓名的英语字母顺序排列。本卷收录了从弗莱雷到凯伊等25位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

主编扎古尔·摩西为本书专门撰写了题为《派地亚星系》的前言。读者可从中看到他对出版此书的原因所作的透彻分析,并可了解收入本书的著名教育思想家的遴选过程,内容的编排以及读者对象。

国际教育局在瑞士日内瓦的全体工作人员担任了本卷的编校工作。

参加本卷中文版出版工作的除署名译者外,梅祖培、冯明霞、赵湜、张元一、杨红、龙治芳等参加了译文的审校工作。

编辑

GAO-091/b
03

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

第二卷

扎古尔·摩西 主编
梅祖培、龙治芳等 译



21531186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国外版权

Editor: Zaghloul Morsy

Thinkers on Education

Prospects No. 87/88

Unesco Edition

根据《教育展望》第 87/88 期译出

责任编辑: 龙治芳

责任校对: 徐元歌

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810 电话: 6022134 电报挂号: 623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21.75 印张 字数 405 (千)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 6022124

ISBN 7-5001-0369-7/G·71 定价: 16.00 元

序 言

本书是四卷本《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的第二卷。全卷共收集100篇介绍世界各国最负盛名的教育思想家的文章。全书的四卷本分别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的教育杂志《教育展望》1993至1994年各期,即第85/86、87/88、89/90和91/92各期的合订本形式出版。全书所录人物介绍文章均按人物姓名的英语字母顺序排列。本卷收录了从弗莱雷到凯伊等25位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

主编扎古尔·摩西为本书专门撰写了题为《派地亚星系》的前言。读者可从中看到他对出版此书的原因所作的透彻分析,并可了解收入本书的著名教育思想家的遴选过程,内容的编排以及读者对象。

国际教育局在瑞士日内瓦的全体工作人员担任了本卷的编校工作。

参加本卷中文版出版工作的除署名译者外,梅祖培、冯明霞、赵湜、张元一、杨红、龙治芳等参加了译文的审校工作。

编辑

目 录

保罗·弗莱雷	海因茨-彼德·热拉特	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贝尔纳·若利贝尔	25
弗里德里希·福祿培尔	海尔默特·黑兰德	37
福泽谕吉	春作西川	53
默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克里什那·库马尔	65
加扎利	纳比勒·诺法勒	75
弗朗西斯科·希内尔·戴·洛斯·里奥斯	胡利奥·鲁伊斯·贝里奥	95
季米特里·格利诺斯	玛丽·埃列乌	108
保罗·古德曼	埃德加·Z. 弗里登伯格	122
安东尼奥·葛兰西	阿蒂略·莫纳斯塔	140
尼古拉·格伦特维	麦克斯·劳森	153
玛丽娅·格日戈热夫斯卡	阿莉恰·谢马克-蒂利科夫斯卡	162
格奥尔格·黑格尔	于尔根-埃卡特·普莱内斯	174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	诺尔贝特·希根海格	183
威廉·冯·洪堡	戈德·霍恩多夫	197
托尔斯滕·胡森	T. 内维尔·波斯尔思韦特	207
塔哈·侯赛因	阿卜杜勒·法塔赫·贾拉勒	216
伊万·伊里奇	马塞拉·加哈尔多	237
卡尔·雅斯贝斯	赫尔曼·霍恩	246
加斯珀·梅尔乔·霍维利亚诺斯	安吉利斯·加利诺·卡里略	262
马克-安东尼·朱利安	雅克利娜·戈特兰	276
艾萨克·利昂·坎德尔	欧文·波拉克	288
伊曼努尔·康德	海因里希·坎茨	299
格奥尔格·凯兴斯泰纳	赫尔曼·勒尔	314
埃伦·凯伊	托尔比约恩·伦博恩	328
本卷作者介绍		340

保罗·弗莱雷

PAULO FREIRE

(1921 -)

海因茨-彼德·热拉特

保罗·弗莱雷出生于巴西东北部一个州的州府城市累西腓，此地是这个拉丁美洲大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弗莱雷虽然生长在中产阶级家庭，但他却对该地的穷人教育发生了兴趣。他取得了律师资格，为各级教育提出了教学“体系”。在国内他曾两度入狱，在国外却享有盛名。今天，保罗·弗莱雷一定会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教育家。

他的教育“系统”的根本原理指明了一种突出强调学生生活环境的教育过程。弗莱雷认为，学习者必须把自身的现实理解为其学习活动的组成部分。仅设想一个学生能读懂“夏娃看见了一串葡萄”这句话是不够的。学生应该学会从夏娃的社会背景中去认识她，弄清楚谁是这葡萄的生产者，谁又是劳动的获益者。

弗莱雷被指控为“革命者和无知之徒”，随后被监禁了75天。1964年，又因这一“系统”而被驱逐出境。此后他在智利生活了四年，又在美国生活了一年。1970年，他移居日内瓦，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工作。1980年，他重返巴西，“重新了解”自己的国家。

保罗·弗莱雷出版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已被翻译成18种语言。世界上20多所大学授与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最著名的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是为世界的穷人而作，也是献给那些与穷人认同，分享他们的疾苦，并为他们而斗争的人们。

1989年，他担任巴西人口最稠密的圣保罗州的教育部长。任职期间，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实施他的思想，审议课程设置和提高巴西教育工作者的工资收入。

保罗·弗莱雷极富幽默感，同时对各种非正义的现象深恶痛绝。他与第一个妻子埃尔萨养育了五个孩子。埃尔萨去世后，他又与他的学生安娜·马里亚结婚。

本文旨在对保罗·弗莱雷作一详尽的介绍——对其本人生平及其著作作一历史性的概述。

早期印象和影响

1921年9月19日，保罗·弗莱雷出生在累西腓市一个宪兵军官家庭。弗莱雷及其兄弟姐妹从小按传统的天主教方式，受到母亲的教育。父亲与该城市宗教界人士来往甚密。

弗莱雷回顾父亲在巴西中产阶级家庭中的有力地位时，常常说父亲总是乐于与家人

交谈。他将孩子养大成人，既是个严父，又有着善解人意的一面（弗莱雷，1978c，第2页）。这就是他对某种相互交流观点的早期接触吗？

父亲用木棍在孩子的文化世界的沙滩上写字。这样，在保罗上学之前，就教会了他字母表。然后他把这些词分解成音节并把这些音节重新组合成新的词。这就是他后来的识字训练“方法”的预示吗？

1928至1932年，世界经济出现危机，弗莱雷一家竭力保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但母亲时常感到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他们迁居外省，来到雅博阿唐附近的城镇，那里生活费用较低。这使弗莱雷在中等教育阶段辍学两年。直到中学毕业，他都被视为成绩中等的学生。他20岁开始学习法律，由于家中经济拮据，曾数度中断学业。他很小就得自食其力并在经济上帮助家庭。

据弗莱雷自己介绍（弗莱雷，1985a，第9页），当时对他产生过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律师兼哲学家鲁伊·巴尔博扎；一个是医生卡内罗·里贝罗。两人都是超越了其学科边界的巴西伟大的学者。获得法律学位使弗莱雷有资格在中学任教。1944至1945年，他教授葡萄牙语。此外，他还兼任一个工会的律师，并给累西腓郊区的工会会员讲授法律知识。

1944年，弗莱雷与小学教师埃尔萨·马利亚·奥利维拉结婚。在他的自传中，他提到她跟他一样信奉天主教（弗莱雷和邦迪，1975，第12页）。她鼓励他系统地探讨教育学问题。1986年她溘然去世。在此之前，她对她的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由于与州工会接触，弗莱雷在社会工业服务社的教育文化部谋到一职（弗莱雷，1959，第14和17页）。1954年他任该机构的主任，但由于采取了民主、开放和自由的管理方式而受到批评，此后他便辞去此职。

在社会工业服务社的幼儿园和学校里，弗莱雷设法让学生和家长参加有关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和学生一起讨论就是在考虑他们的社会和家庭环境。而像营养不良、童工之类的问题只有通过学生家长的参与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在所谓的“工人俱乐部”组织内，弗莱雷及其同事试图鼓励工人“讨论他们的个人问题和一般性问题”（弗莱雷，1959，第15页）。他设法告诉工人不能把解决他们的问题的责任完全推给社会工业服务社。他们应该自己设法克服困难和排除障碍。这一工作的目的在于“使工人和历史进程结合起来，”并“激励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组织个人的生活，”（弗莱雷，1959，第17页）。

尽管社会工业服务社的机构狭小，但弗莱雷证实对话，“代议制”和自治的原则是可以部分地在这些机构内部得以实现的。应该运用这三条原则，使“巴西实现真正的民主”（弗莱雷，1959，第15页）。为了参加巴西的“民主觉醒”运动，弗莱雷不仅参与了社会工业服务社的工作，而且还参加了许多其他的活动。由于受到天主教思想家阿尔塞乌·德阿莫罗斯·利马和“新学校”教师阿尼西奥·特谢罗的影响，他参加了累西腓地区许多教区的主要受天主教影响的基层活动。例如，在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卡萨·阿马雷拉”教区的牧师和教民共同制定的一个计划。在该计划中，教区的从幼儿园到成人教育的

七个教育单位共同参与课程设置的师范教育工作。此活动的成果与其他教区人员分享,鼓励他们开展组织和内容安排方面的工作。弗莱雷称这种联合行动为“参与者的议会化活动”(弗莱雷,1959,第129页)。学习小组、行动小组、圆桌讨论会、辩论活动以及分发带主题的抽认卡是这一活动常用的方法。

就这样,弗莱雷及其合作者们开始谈到一个教育法“体系”,即“保罗·弗莱雷体系”,它适用于各个层次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马西埃尔,1963)。后来,在1970至1980年代,该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识字技巧,被命名为“保罗·弗莱雷方法”,而觉悟启蒙一词则成了通向革命的万能之物。由于这一原因,弗莱雷就不再提这些术语了,以突出强调教育的政治性特征及其在不同历史环境下进行“再创造”的必要性(如弗莱雷,1985b,第171页)。

大学时期

弗莱雷致力于改革教育并参与社会工业服务社和天主教教民运动的活动,这使他获得了在累西腓大学兼职讲授教育学的职位(弗莱雷,1971b,第499页)。该大学想聘请一个经验丰富并有改革精神的人,以便使其他地方,如大学或美术学院的人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思想(1955)。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巴西的政治生活被巴西真正的发展模式的捍卫者们称为“人民的出现”。包括埃利奥·雅瓜里布、阿尼西奥·特谢罗、罗兰·科尔比西耶和阿尔瓦罗·胜埃拉·平托在内的知识界人士根据欧洲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如卡尔·曼海姆、卡尔·雅斯贝斯、贾纳尔·默达尔和加布里埃尔·马塞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们的中心是里约热内卢的高级巴西研究院。弗莱雷在大学期间与各种政治潮流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参加了天主教世俗运动的活动,此后,他又开始大量阅读天主教左翼作家,如雅克·马利丹、托马斯·卡多内尔、埃曼努埃尔·莫尼耶的作品,并阅读介绍这些作品的巴西学者,如阿尔塞乌·德阿莫罗斯·利马、恩里克·利马·瓦斯、赫尔伯特·约塞·德索萨等人的作品。

天主教学生俱乐部是这一社会与政治大动荡时期最激进的组织之一。大学学生要求彻底改革卫生和社会机构,改革住房体制(德卡特,1970,第62页)。过去,学生只是提出建议。现在恰恰相反,他们参观贫民窟,与居民讨论他们的问题,并发起运动以改变那里日常生活的糟糕状况(派瓦,1973)。

弗莱雷在大学工作期间对激进的天主教学生运动的思想日趋熟悉,拓宽了对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范围,使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更为系统化(弗莱雷,1985a,第11页)。

他在这一时期的著述已能明显反映他所独有的写作风格。他实际工作经验丰富,这使他能对截然不同的理论与作家作出准确的评价,把它们揉合在一起以与自己的经验相适应,但这也引起了争议(如萨维尼亚尼,1990;雅里斯,1987;奥尔曼,1987)。他从不否

认为自己是一个兼收并蓄的人，特别援引了如雅斯贝斯，后来又援引了马克思的部分观点。他不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或存在主义，因为他在这两位作者的著作中看到了一些值得讨论的论点（弗莱雷，1978，第12页）。

根据我的判断，弗莱雷家乡的这所大学当时的主导文化对他施加的“理论”要求和兼收并蓄，可为他的这样一种倾向提供解释：他撰写“沉闷的哲学文章”，以此来掩盖他的实际性工作（波士顿，1972，第87页）。因此，他的写作风格使读者迷惑不解。只要他本人到场发表演讲和授课，就会产生最大的影响，因此赢得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他们乐于实验并发扬他的工作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享有与本世纪许多其他教育家，如蒙台梭利等相似的声望（勒尔斯，1982，第528页）。他们都在各自的时代把教育当作艺术、科学和政策“加以彻底改造”（弗莱雷，1981d）。

弗莱雷认为，学生在大学内外开展的政治活动对巴西向民主社会的转折阶段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这与他的许多同事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在大学讨论国家大事十分重要。弗莱雷并不是要借助纪律手段力图恢复法律和秩序，而是与学生一道共同寻求解决国家最紧迫问题，如“教育人民”的办法（弗莱雷，1961a，第23页）。

弗莱雷在其博士论文中详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弗莱雷，1959），但此文未获得大学答辩委员会的批准。鉴于弗莱雷对巴西大学体制的落后状态提出的批评，该委员会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逻辑的。大学的这种体制辜负了“转折”时期人们所寄与它的期望。

但弗莱雷仍然获得了继续在大学工作的机会，原因是他与若昂·阿尔弗雷多·贡萨尔维斯·达科斯塔·利马私交不错，而此人曾任累西腓大学第一副校长，1962年又晋升为校长。弗莱雷出任负责学生关系的特别顾问，后来于1962年担任该校推广服务处主任职务。

弗莱雷还象在社会工业服务处工作时那样，为了推动巴西的转折进程，他并未使自己仅陷于本职工作的圈子之内。1960年，当累西腓市政府在左翼人物阿赖斯的领导下发动了大众文化运动时，弗莱雷就站到了该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和发起者一边。

保罗·弗莱雷曾担任教育系成人教育项目协调员。他积极支持发动大众文化运动的倡议行动，并高度赞扬该“运动”是一场“人民的行动”。但后来证明，该运动中的天主教、新教和共产主义者却对其教育和组织任务有着不同的解释。一本成人识字课本使弗莱雷的教育系在施教过程与增强文化意识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热拉特，1978，第65页）。

识字课本的作者（戈多伊和科埃略，1962）采用一种直接的政治方式教授五个“能生成句子的词：人民、选举权、生活、健康和面包”。用这些词的的音节可组合成这样一些句子：“选举权属于人民”，“没有住房的人生活在贫民窟”，“只有根除痛苦，东北才会有和平”以及“和平的基础是正义”。这些句子的目的是为了发起政治讨论并为这种讨论注入形式和内容（热拉特，1978，第68页）。

弗莱雷强烈反对向没有文化的人制造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来自左翼还是右翼，因为这在任何时候都起到“驯化作用”。双方都要求人们不加可否地接受他们的观点。这将引起人为的操纵。

1961年,弗莱雷认为避免操纵有两层意思:信念与观点(即课程设置)必须直接来自人民,必须由他们准备,但这些信念与观点必须与“转折”阶段相适应。根据高级巴西研究院和天主教激进分子的分析,巴西当时正经历着这样的转折阶段(弗莱雷,1961a,第24页)。

然而,弗莱雷并未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大众文化运动的部分人士以列宁的政党学说为指导,开始采用直接的工作方法。30年之后,弗莱雷又将经历类似的冲突。结果,弗莱雷与大众文化运动的合作少了,他在大学推广服务处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开始详述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推理能力,因此,他们在他们学习阅读和写字时就对他们进行了视、听觉方面的实验。他在一次早期试验中,与一个不识字的女佣人谈论一张投影幻灯片,图片上有一个男孩和葡萄牙语表示男孩儿的单词(menino)。弗莱雷一遍又一遍地分析该词的各个音节并重复念这个词,此时他观察到马里亚注意到音节的存在而因此“了解到”该词是由几个音节构成的(弗莱雷,1970b,第9页)。

弗莱雷想激发不识字的人对词语和音节感兴趣,但仍缺少刺激因素。缺少对单词的“介绍”。他在为社会工业服务所和大众文化运动工作时,就已经发现许多工人对直接关系到自己的需要与困难,并且是用我们今天称为的传媒(电影、幻灯等)加以介绍的“政治”问题感兴趣。有必要展示涉及到人民的实际问题的图画,并读、写表达这些问题的词语。

经验告诉他,一开始就集中讨论现实问题是不够的。对不识字的人最强烈的影响是他们在学业上和在其他学习上的失败。为了减少这些心理障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弗莱雷实验性地将人类与动物在各自特殊环境中的能力区别开来。对民间艺术(陶器、编织、木雕、演唱、民间戏剧等)的欣赏也表明了这种差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最先提出了这种区别并对这种区别进行了理论阐述: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弗莱雷最初是在一个文化团体中开始实验性地运用其新的识字训练方法的,因为他作为监督员协调该团体的工作,该团体的成员也都是他的熟人。弗莱雷在他的著述、采访调查和讲课中仅“用一个成员的话零星地谈到他在多纳·阿尔盖林文化中心第一次运用这种扫盲识字方法的情况”。该中心是大众文化运动在累西腓波索·德帕内拉区的一个文化团体。这个团体讨论的都是些日常问题(热拉特,1978)。

成 功

弗莱雷介绍说,一个学员仅经过21小时的识字训练之后就能读懂简单的报刊文字,写出简短的句子。幻灯片尤能引起浓厚的兴趣,有助于激发学员的学习积极性。30小时(每周五天,每天一小时)后,实验结束。三个学员学会了阅读和写作。他们能读懂短文和报纸,并能写信。有两个学员中途退学(弗莱雷,1963a,第19页;1974b,第58页)。弗莱雷的扫盲识字“法”就这样诞生了。

1983至1986年间,此方法在圣保罗省迪亚德马市得到运用(维尔纳,1991,第136

页), 1989 至 1992 年间圣保罗市亦在“弗莱雷实施期间”根据引起争议的 MOVA 框架采用了这一方法。迄此, 虽然根据不同的扫盲地点的社会经济状况改变了该方法的次序和内容, 但其步骤仍保持不变(热拉特, 1983, 1989)。这些步骤可总结如下:

施教者对学员进行观察, 以“了解”他们所使用的词汇。

在两个层面上努力搜集生成性词语和内容: 丰富的音节和高度的个人参与。

首先用视觉形象对这些词汇进行整理, 这将使“淹没在无声文化之中的人们受到激励, 而“表现”为自身文化的刻意创造者。

引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并以此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一个“文化班的人”在协调员幕后推动下, 把生成性词语和主题内容用于阅读, 该协调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师, 而是学员与教员对话中的教员兼学员。

创造性地对词语加以整理, 有明确的批判性和行动的目的性。在此过程中, 这些以前目不识丁的人开始拒绝仅仅充当大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客体”。他们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体”。

这种“方法”在巴西全国大获成功。现在有可能让全国没有文化的人——当时共有 4000 万——能读书写字(成为被授与选举权的有文化的人)并认识到国家面临的问题。弗莱雷及其小组得到改革派人士和左翼势力的支持, 并不久就受命担起了实施《全国扫盲培训计划》(1963) 的任务。资金从四面八方涌来, 资助者中有累西腓进步联盟在该地区的办事处, 东北省的改革派政府和若昂·古拉特的巴西人民党联邦政府(曼弗雷迪, 1976)。

弗莱雷当时已经成为国内迅速发展的大众文化运动中的扫盲运动的协调员, 但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和其他基层的扫盲方法在全国的实施可能导致的潜在问题。巴西利亚的试点成效甚微(热拉特, 1978), 这清楚地表明这位此时已闻名全国的教育家已陷入困境, 在国家控制的教育体制中实施其“文化自由行动”, 困难重重。

1964 年 3 月, 巴西军队推翻联邦政府, 弗莱雷的伟大实验因此搁浅(斯基德莫尔, 1967)。直到 25 年之后他才有幸再度担任高级行政职务, 但他和他的合作者们仍将面临相似的困难。

流 亡 生 活

弗莱雷因其“颠覆性方法”两次受到军方监禁。唯有玻利维亚大使馆为他政治避难提供保护。玻利维亚政府聘请他为教育部顾问。然而在他抵达拉巴斯 20 天后, 又一次目睹了一次军事政变。帕斯·埃斯登索罗领导的改革政府被推翻。

在智利

弗莱雷决定向智利寻求避难。当时爱德华多·弗雷因民粹主义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而开始执政不久。他在智利度过了四年半的时间，供职于一个称为农业改革培训研究所的政府研究单位和由瓦尔德马·科尔德斯领导的政府成人教育局。他成为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的教授并担任教科文组织圣地亚哥地区办事处特别顾问。

弗莱雷在他流亡的第二个国家，主要从事农民成人教育方面的工作。智利农业正经历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这给农村带来了新式机械和新的知识，但财产和分配制度却丝毫没有改变。弗莱雷为此提出一项教育计划，以突出反映这种矛盾现象，推动寻求解决办法的讨论。弗莱雷开始认识到，在美洲称为“进步联盟”的改革都是北美向南美实行微妙的现代科技统治的幌子。打着“技术援助”旗号对南美的技术输出被用作维持政治和经济依附关系的手段。这便解释了弗莱雷为什么在离开巴西后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中突出强调了他提出的“文化侵略”的概念（桑德斯，1968）。

在这一时期，弗莱雷对“农村推广”问题进行了分析。《是推广还是交流》（弗莱雷，1969b）一文便是此分析的结果。此文论述了发展中的农业社会的技术人员与农民的交流问题。他反对各种文化推广概念和关于文化交流的概念。他认为前者有其“侵略性”，而后者则是提高认识。他指出，农民与农业技术专家的相互作用应有助于对话。如果新的知识与人们的环境相矛盾，他们是不可能去学习这种新知识的。不了解农民的世界的教育家兼农业专家是无法试图改变后者的态度的。此文的另一个目的是想突出强调促进实行自由的教育所包含的原则和基本要求。实行自由不应该仅限于简单的技术援助，还应包括人们对自身和他人的认识（弗莱雷，1969b）。

1967年，弗莱雷以各州立大学举办的研讨会特邀发言人的身份首次赴美。此时正值他的第一本书，也是当时的唯一一本书（1968年在智利出版）《教育：自由的实践》在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和纽约受到知识界的高度赞扬之时。1969年，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邀请他作为期两年的教学。八天之后，他又收到瑞士日内瓦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邀请信，聘请他为专职顾问，当时该组织正在前非洲殖民地的自由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美国

保罗·弗莱雷迫切地想对北美文化“进行实验”，了解第三世界（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贫民窟）在第一世界中的情况（弗莱雷，1985b，第188页）。但这样就会失去与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具体的教学实践的联系，他对此感到遗憾。他认为离开南美大陆仅在图书馆进行研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他向哈佛大学提出只停留六个月。

弗莱雷作为“发展和社会变革研究中心”的一名教授在哈佛大学工作。在此，他明确地确定了《争取自由的文化行为》一书的内容形式（弗莱雷，1970a）。他在书中，将其有关文化行为的观点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鲜明对照，这是他在美国能够进行详尽研究的

课题。半年后，他担任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教育分会的顾问，其职责之一是充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顾问。

1970年以后，弗莱雷的教学法理论和实践才得到世界的公认。在流亡中，保罗·弗莱雷撰写了其最著名的论著《教育：自由的实践》（弗莱雷，1974a）及《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弗莱雷，1970d）。第一本书综述了他以前发表过的各篇论文，包括其博士论文（弗莱雷，1959）的观点。他为巴西从殖民地农业社会转变为独立的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提出了教育学方面的建议。这一阶段的三个主要问题——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乡居民中的文盲问题——都必须通过新社会的建设加以解决。必须通过实践民主而学会民主（弗莱雷，1974a）。

十年后，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自1968年是葡萄牙语手稿，1970年该书的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问世）一书中，他倡导一种革命的教育学，旨在唤起被压迫者在争取解放中的思想觉悟和创造力（奥利维拉等，1975，第24页；弗莱雷，1970d）。

在《教育：自由的实践》一书中，科学和教育是相对中立的，而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中，它们成了阶级斗争的战略武器。弗莱雷最初强调自然与文化、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联系与对峙关系（作为社会解放的手段，教育的目标是文化的解放），后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从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中的不公正的机构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上。此时的教育目标是促进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

至1964年，在弗莱雷关于巴西的第一个转折时期，特别是与关键性的过渡时期的概念有关的论述中，出现了几个认识论方面的观点：（a）提高和运用批判性意识，是“批判性教育工作”的产物；（b）教育任务是提高觉悟过程中的一种工具，它取决于两种基本态度和行动——批评与对话；以及（c）批判的觉悟是具有真正民主特征的社会所特有的。这些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的推理能力”完全可以发现“真理”。他就是根据这种假设成功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扫盲训练方法的。

流亡中的弗莱雷更加强调的是黑格尔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不是西方民主所谓的自由理想）中的压迫者（而不仅仅是一种“沉默的文化”）的主题思想。他还突出阐明了科学与教育的政治性质（弗莱雷，1970d）。

弗莱雷1964年以前在巴西就曾清楚地意识到其教育计划会带来的政治代价和困难。然而，他所提出的认识论假说使他认为这种阻力是相当偶然的現象，对某一特定的专制政府及与其结盟的利益集团加以战术上的反对就一定能排除这种阻力。他的有关意识和知识理论假说由于明显地采取了一种新的政治角度而发生了变化。弗莱雷以“战术”转向“战略”。“觉悟启蒙过程”变成了阶段斗争的同义词。文化一体化变成了政治革命。这一点在弗莱雷的有关关键的过渡性观念中再一次有了特殊的反映：在早期的著作中，它与科学态度的概念（杜威）颇为相似。后来，对关键的过渡性意识变成了革命的意识（弗莱雷，1974b，1970d；参见斯基帕尼，1984）。

《教育：自由的实践》与《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在援引的权威人士与参考文献（从舍勒、奥尔特加·Y. 加塞，曼海姆、赖特·米尔斯，怀特海等人变为后来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马库泽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亦表明弗莱雷认识论主张已经发生转变。当然